

导 言

很少有什么嗜好会像史前考古学那样使人变得如此健康而富有哲理。

（泰晤士报，1924年1月18日）

约翰·温德汉姆（John Wyndham）在《秘密的人们》这本他较少为人所知的早期小说里，让他所写的一个角色说：“他是个考……，考……，总之他挖掘那些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好处的东西。”这确实是对考古学家所干的事情的一种偏激然而传播广泛的观点。而在另一极端，人们的看法又变得抒情起来，就像卡斯滕·尼布（Carsten Niebuhr）所说的，“那些唤回已经消逝的事物重见天日的人享有着犹如造物的狂喜”——而且确实有些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创造”感到如此骄傲，以致他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与上帝十分相似。

对一般公众来说，考古学似乎与发掘同义，就好像这是这一领域的工作者成年累月所从事的唯一工作：在英国的讽刺杂志《私人之眼》（*Private Eye*）中，所有的考古学家都被无意识地描绘成“处身于洞穴之中长胡子的人”。卡通片通常将考古学家描绘成执拗顽固的老古板，身上披满了蜘蛛网，对陈旧的骨头与破碎的碗碟如痴如醉。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准确的，但这些只反映了这一领域的很小一部分。例如，有些考古学家从未进行过发掘，而只有非常少的考古学家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发掘上。

那么考古学究竟是什么呢？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个

词来自希腊文 (arkhaiologia, “ 论述古代的事物 ”)但在今天, 它已经转变成意指通过遗存下来的人类过去的物质遗迹而对人类过去的研究。在这里“ 人类过去 ” 这一词汇需要加以强调, 因为考古学家并不研究恐龙或是岩石本身, 这与许多公众的信念相反, 这种误解之所以产生要感谢燧石与穿着令人难忘的毛皮比基尼的拉奎尔· 韦尔奇 (Raquel Welch)。① 恐龙与岩石是古生物学家与地理学家的领域; 在最早的人类开始进化之前几千万年, 恐龙就已经灭绝了。

考古学真正开始于最早的、可以识别的“ 器物 ” (工具) 出现之时——就现有的证据看来, 这是大约二百五十万年前在东非出现的——并一直延伸到今天。昨天你扔在垃圾箱里的东西, 不论多么无用、可厌、或是潜在地令人难堪, 现在都已成为了新近考古学纪录的一部分。虽然大部分考古学家研究遥远的过去 (在时间上回溯几世纪或几千年), 但有日益增多的学者转而研究有文字历史的时期, 甚至是相当晚近的现象——例如内华达核试验基地, 极地探险者的棚屋, 甚至纳粹的地堡与柏林墙最近都吸引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在 16 世纪末叶, 威廉· 卡姆登 (William Camden), 第一位伟大的英国文物学者, 曾经将对文物的研究描述为一种“ 回头看的好奇心 ”——换句话说, 一种要了解过去的欲望——而许多投身这一学科的人都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好奇者。这是一个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行为古怪的人的学科, 但它那广阔的领域又使它能够包括某些适应所有类型的人的东西。羞涩而孤独的性格内向者会在此找到满足, 他们把自己关在尘封已久的房间里, 摆弄着旧钱币或是器皿或石头的碎

这是一部影片中的角色。

片，而急躁活跃的性格外向者可以在野外长期地工作，四周围绕着由拥有难以置信的热情的人们所组成的庞大队伍。

考古学的乐趣之一就是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盘中餐，只要你能够筹集到资金开始工作。你可以在地上打一根钉，或是选择任何一个时段开始你的工作，这里总会有某个考古学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不论是在茂密的丛林中，还是在幽深的洞穴里，不论是在如火的沙漠里，还是在冰封的山岭上，你也毋需被限定在陆地上——如果你的癖好如此的话，你可以成为一名水下考古学家或是以空中摄影作为自己的专业。由于这一专业包容了我们历史的全部，所以可以在从远古人类到中世纪或工业化时期的整个范围内进行选择，你可以研究最粗糙的石器工具，它们仅仅与自然岩石有着微小的差别；也可以去分析卫星照片，以确定考古遗址的年代。在这里，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做每一件事情。

你可以选择去进行集中发掘，也可以去进行广泛的表面探测，你可以把时间花费在整理不同类型的器物上，也可以把时间花费在最抽象的理论概括上，去告诉人们他们错在哪里，为何他们不正确。你可以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或是实验室里。你可以在博物馆里或是地区考古单位里工作，把你的生命奉献给教学或是创造性研究（有少数人甚至同时兼顾两者），或者你可以呆在“专业”之外，而被打上“业余爱好者”或是“业余考古学家”的标记：多年以来，“业余爱好者”曾经对考古学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并且还在继续作出这种贡献，虽然学院的象牙塔中的职业学者常常对他们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并且常常对他们报以冷嘲热讽。实际上，许多“业余爱好者”可能比“职业者”要渊博得多，也要比那些只把考古学视为一种职业，或是一种谋生手段的人

富于献身精神得多，考古学燃起了他们的激情，占去了他们的周末与每一点空闲时间。自然，这可能扯得太远了，而没有什么比那些人——职业者或是业余爱好者，对他们来说，考古学是一种吞噬一切的无法摆脱的痴迷——更糟或更令人厌烦的了。这有助于保持这一学科的洞察力，并且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本质上不过是在死人的遗物上嗅来嗅去并试图去猜出他们如何生活罢了。

如果你梦想着从事一种相当活跃或奇异的工作，而又不希望（或没有这种能力或资金）进行发掘或探测，那也还有足够的其他选择：例如，试验考古学，或“人种考古学”或岩石艺术研究。你可以呆在自己的扶手椅里，或者周游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可以实践你的语言技能。你可能需要去研究野生动物的行为与习性，或是农耕的雏形；你可能发现向他人请教很有用，你会去向那些诸如采石、木器、造船或制陶等传统工艺方面的专家请教，或是向那些在航海或天文方面学有专长的人请教。换言之，从事考古学就好像是同时在上整整一组夜校的课程。

可能性的范围是无穷的，所以毫无疑问这本短小的书远远无法穷尽这些可能性。它只能对今日考古学所关注的几个主要领域投以匆匆的一瞥，以吊起你的胃口，并激励起你自己去回头看看的好奇心。

大多数考古学家需要充分具备的品质之一，不论他们的专业领域是什么，就是乐观——即，他们可以只依据过去的物质遗存说出关于过去的有意义命题的信念。他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正如罗伯特·贝德纳里克（Robert Bednarik）新近所指出的，是“在考古学所研究的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事物中有 99.99% 以上没有任何种类的证据幸存超过一秒钟。

在仍然不可计数的留存下来的事例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一百万分之一这样一个微小的比例有证据留存下来。其中，只有无穷小的一部分被考古学发掘了出来，而其中更小的一部分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但是，不要让这一点使你分心——相反，大多数人将这种情境当作他们的优势：有些人把时间花在设计方案填补证据中存在的鸿沟上，以产生阶段或类型的连续性；其他人则简单明了地漠视资料是如何糟糕与不具代表性，而不顾一切地用它们来生产有关往日的故事。正如哈佛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写的，“如此之多的科学在通过讲故事而取得进展——但在最好的意义上，故事仍然只是故事。考虑关于人类进化的传统图景——关于狩猎、营火、黑暗的洞穴、仪式、制造工具、老年的来临、争斗与死亡的故事。这里面有多少是基于遗骨与器物的，又有多少是基于文学的准则？”



“只有你和我留下了，上校！”

你也许认为从事历史考古学会使你踏在坚实的基础上，但决非如此。自然我们对于这些文化的某些方面知道得更多，因为它们留下了文字记录，但是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你仍然不得不把偏见与不确带入自己的论述。例如，所有关于卡斯特（Custer）在小比格霍恩战役（the 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中的惨败的残存文件与目击者的描述都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不仅是在有关发生了什么与如何发生上不同，而且甚至在诸如每一方的人数这样的方面也不同，而这是发生在 1876 年的晚近事件。正如 A·J·P·泰勒（A. J. P. Taylor）所说，历史不是事件的目录而是对事件的看法。

当然，你也可能在考古学家的行列里找到悲观主义者——他们相信他们所研究的被废弃的产品毫无用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也是同样的毫无用处。不可否认，考古学是一门“奢侈的”学科，它常常需要证明它存在的价值，但是同时它也是普通公众中的大多数人从中找到迷恋与乐趣的学科，正像考古节目居高不下的电视收视率（特别是在涉及埃及的时候）所表明的那样，而考古学对于世界旅游业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

从更为个人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是一门你能够尽情享受自己工作的学科，在这里，你可以遇到或密切接触到全球许多友好的和具有同样思想的人们，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反过来说，占山为王、怨毒、暗算与邪恶的内部斗争的程度由于某种原因也比在其他学科中通常所遇到的要严重得多。如果你计划进入这一领域，你就需要一张犀牛那样坚硬厚实的皮。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考古学家浮夸自负、虚伪、不诚实、自命不凡、自我吹嘘与寡廉鲜耻，而这些并不会妨碍他

们在专业上获得成功。实际上恰恰相反。（天哪，我不能在这里举出某些例子，虽然我很想这样做，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总而言之，考古学就像是一座最为宽敞的教堂，总能为每一个人提供某些东西，也总是欢迎每一个人——甚至或是特别包括，不合时宜的人、木讷朴直的人与受到社会挑战的人，他们发现考古学比在互联网上漫游与冲浪更令人满足。

因为没人知道在过去发生了什么（包括在晚近的有文字记载历史的过去），所以，考古学的研究将永远也不会终结。理论将会轮番出现与消失，而新的遗迹或发现将改变已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虚构故事，这些虚构构成了有关过去的正统观点，并且通过大规模的重复与广泛的传布而为人所接受，从而逐渐被确立下来。正如马克斯·普朗克所写到的，“科学真理并不能通过使其对手信服与使其看到理性之光而取得胜利，而只能由于其对手死亡而新一代成长起来，并熟悉这一真理而取得胜利。”

考古学是一种终身的探索，永远也不会真正有一个结果；它是一次无尽的旅行，没有真正的终点。一切都是尝试性的，没有什么是最最终的定论。

为了免得让上述议论听起来像充满偏见的琐屑，让我们安下心来确认考古学仍然充满了无穷的乐趣，并且可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像冰人（*Iceman*）与兵马俑这样真正超越常规的发现可以吸引整个世界的瞩目。很少有其他学科能够这样夸口。

一 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

考古学就像怀旧一样，并不总是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它来自何方？“对考古学的考古学”是什么？

大多数人类都对过去有某种兴趣。确实，这种兴趣再加上下述事实：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走向死亡与我们是唯一有能力摧毁我们星球的生物，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似乎人类总是对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遗迹感到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从何时开始的，但是有许多实例表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经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巴尔干的一位公元 5 世纪的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拥有一份石器时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 15 世纪与 16 世纪的易洛魁人遗址中也有着几千年前的人造物；而在南美，据说印加帝国的皇帝们曾经收集了穆奇（Moche）文化的富丽堂皇的绘有色情图案的陶器，这些陶器在当时已是若干世纪之前的古董了。

现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学家”是巴比伦的国王纳布尼都斯（Nabonidus），他在公元前 6 世纪发掘了一座庙宇，一直挖掘到一块数千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 D·W·格里菲斯于 1916 年拍摄的壮观的默片《党同伐异》中，有一个场景有下面这样的镜头：“贝尔沙撒”（Belshazzar）的父亲有了一个喜庆的日子。他发掘出了纳拉姆一辛（Naram - Sin）神庙的奠基石，这座神庙是三千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间，他察觉到波斯人居鲁士（Cyrus），巴比伦最强大的敌人，正在靠近这座城市。这表明甚至考古学最早期的开拓者

们也深深地迷恋他们的专业并且常常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那时的“考古学家”并不总像今天的考古学家那样。实际上，在希腊，在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这个词指的是一类演员，他们用戏剧性的摹拟表演在舞台上再现古代的传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学”这一词语是由 17 世纪时里昂的一位医生兼古物学者雅克·斯蓬（Jacques Spon）重新创造出来的。他也提出了“archaeography”^① 这个词语，但这个词像掉在石头地面上的陶器一样摔得粉碎。

在罗马时代，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战士发现了许多伟大古迹的坟墓，当时他们正在意大利与希腊建立殖民地；他们从这些坟墓中劫夺陶器和青铜器，这些东西在罗马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这是早期的一个盗墓与古物买卖的实例。据史家修托钮斯（Suetonius）所说，甚至奥古斯都大帝也曾经收集“已经灭绝的海洋与陆地怪兽的巨大遗骨，它们通常被称为‘巨人’之骨’与古代英雄们的武器。”

到中世纪时，欧洲的人们逐渐为“奇妙的废物”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瓮）由于自然侵蚀或是穴居动物的活动而神秘地从地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人工制造的燧石与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经常由于农夫耕耘土地而重见天日。根据流行的信念，这些器物是精灵的弹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实际上，它们为甚至远在非洲和印度的人们所崇拜与收藏，并常常被他们用作护身符或符咒。在欧洲，许多器物被人们收藏在“好奇的柜橱”内，早期的文物爱好者将自然的与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而具有更为开明的头脑的人们慢慢地

^① archaeography 和 archaeology 都是斯蓬创造出来表示“考古学”一义的词语，现行的是后者。

认识到，这些“雷霆弩箭”与“奇妙的废物”实际上是古代人类的人工制造的遗物。与此同时，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雕塑的发现鼓舞了当代艺术家去研究古典的形式，而富有的家庭则开始收集与展出古典的文物。

正是在 16 世纪，在西北欧，有些学者开始真正质疑弗兰西斯·培根的论点，即“大部分远古的时代（除了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没在沉默与忘却之中，”这些学者认识到有关远古过去的信息有可能来自对野外遗迹的研究；整整一大队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学者出发去走访与描述这些遗迹。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这些活动成长成为一种更系统化的兴趣，伴随着日益增加的发掘工作的数量。虽然大多数挖掘仅仅要重新获得来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数开拓者将这项工作当作细致的解剖，他们注意到器物与不同土壤层之间的关系，并且认识到，从总体来说，来自上层土壤的物品必定比来自下层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这种新的质问与读解土地与风景的方法就像一份公文，导致挖掘古墓的疯狂浪潮——即，发掘西北欧或北美的墓葬山丘。这首先是绅士、牧师、医生、商人、学校教师和其他类似的人的闲暇消遣，甚至在今天，这些职业的人也对“业余”考古学作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确实直到 19 世纪中叶早期，考古学才取代了古物研究而盛行起来，这是在渴望更系统、更科学地了解过去遗存的意义上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在西欧发现了石器工具与现已灭绝的动物之间的联系，人类的远古状况被首次证实并最终得到了普遍接受。到 19 世纪末叶，真正的考古学已经是一项蓬勃兴旺的事业，许多“伟人”在勤奋地工作——

比特里 (Petrie) 在埃及，考尔德威 (Koldewey) 在巴比伦，谢里曼 (Schliemann) 在爱琴海，彼特—瑞弗斯 (Pitt - Rivers) 在不列颠。对这些开拓者中的大多数来说 (也许要除去那位圆滑世故、说谎捏造的谢里曼)，考古不再是对宝藏的追寻，而是对信息的探寻，与解答特定问题的手段。

在 20 世纪的年代里，由于以下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不懈努力：诸如惠勒 (Wheeler) 在不列颠和印度，赖斯纳和伍莱 (Reisner and Woolley) 在近东，尤尔和基德尔 (Uhle and Kidder) 在美洲，鲍德斯和勒罗—高汉 (Bordes and Leroi—Gourhan) 在法国，考古学成为了一门基础雄厚的、多学科的学业，汇集了难以计数的领域的专门技能——从地球物理学家 (他们可以借助一系列装置来探测到地表以下的东西) 和空中摄影师，到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化学家，遗传学家和整个系列的其他科学家，他们能够从考古得到的物质中或从包裹这些物质的沉积物中确定日期。

迄今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有这样两个主要的趋势：第一，发掘已经变得比原来缓慢得多，也更细致刻苦。代替了过去人们用鹤嘴镐挖掘 (或者甚至用炸药爆破！) 考古地层的方法，每一地层都被细致地铲起，粉碎，或者刷去，然后每样东西都要过筛，这样才不会遗失土地可能包含的任何一点儿信息。例如，在西班牙的阿塔普尔卡的“遗骨之穴”，这是一个岩洞之中的深处密室，这里藏有至少二十万年以前人类的带有伤痕的骷髅 (实际上，这显然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葬礼仪式)，发掘者每一年的 7 月只移去大约十英寸的泥土。这里已经发掘出了大约三百具人类骸骨，这就是发掘者们可以摆弄的全部东西，因为每一个都必须加以清洗，加固与保存。这项工作难以置信地细致，连留下的沉

积物都要清洗与过筛，所以甚至连内耳的微小骨骼也被发现了。

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不仅获得了数量有着巨大增长的各种类型的材料，而且——感谢新技术与新的科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从每件器物上获得多得多的信息。例如，拿一块陶瓷碎片来说（这是陶器上的碎片，属于最耐久，因而也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遗存类型）：在过去，一片碎片只能简单地依据其形状、材料与装饰而被归类为某一种类型，这就是所能做的一切。但是现在，你可以获得对它的原料的详尽分析，从而使你能够确定这些原料的来源；你还可以获知它是在什么温度下烧制的，以及它是用什么材料烧制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热致发光技术来确定其日期，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分析其内部表面上的沉淀物的最不明显的痕迹，从而告诉我们它原来是用来盛放什么东西的！

换句话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它正在用比原来少得多的材料来做比原来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在生产着比原来多得多的东西。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增长，他们为职位而竞争，并且所有的人都试图产生信息或新的资料。大量的会议与专题讨论会正在举行，其中大部分最终将其成果以书的形式出版。因此，这一专业的文献已经失去控制，一只巨大的多头许德拉（Hydra）^①正带着新的杂志和系列专著年复一年地跃起，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这些资料，甚至连图书馆在这些日子的紧缩预算之下要购买它们也感到很吃力。没有人能指望持有关于

^①许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后为英雄海格力士所杀。

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或某一专业的所有文献，更不用说关于某一大陆的考古学的所有文献了，更遑论全世界的考古学文献了。

在战前情况完全不同。如果你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看一看标有诸如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或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这样的伟大名字的博士论文原稿，你就会发现它们确实篇幅短小，只相当于 1990 年代论文中的一个单独章节。当然，在他们作学生的年代，他们所学习与阅读的考古学要少得多，并且他们也无福享受到伟大的神祇施乐复印机与苹果电脑的庇佑，不得不靠自己的手来记笔记与复制地图。

与此同时，博物馆也物满为患，因为收藏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例如在埃及，考古学家甚至已经在将器物重新埋入地下，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它们将保存得更好、更长久，为了未来的世代能够目睹它们，将它们托付给大地母亲比托付给博物馆的地窖或是仓库更好。正是由于存在着大量未曾发表的发掘成果，所以在世界的博物馆中存在着一座“文物山岭”未曾编目和 / 或未曾研究的物品组成的巨大收藏。这一情况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那不勒斯博物馆不得不在最近关门，因为成千上万的古币和其他东西从它的仓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它的仓房中，只有不到一半的藏品编入了目录。很明显，有许多工作得做，要是考古学要把它那非常凌乱而资料过多的房子理出个头绪来的话。

作为单独学科的考古学

由于 1960 年代重新流行的乐观主义，考古学家已经对他们的专业能够对人类行为研究作出独一无二的贡献这一点

抱有比以往大得多的信心，而这在北美特别重要，以考古学在那里与姐妹学科的关系的观点看来，尤其是如此。

人类学只简单地意味着对人性的研究；在英国，它被分成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与体质（或生态）人类学两部分，前者分析人类文化与社会，而后者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以及他们是如何进化的。然而，在美国，人们也认为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多数学院式考古学家可以在“人类学系”中找到，而考古学在学理上受到人类学的统治，并被当成它的一个子学科，而不是像在旧大陆那样，考古学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全权的学术领域。

考古学曾经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的过去时态”，并且由于它涉及的是人类的过去，所以它无可争辩地是人类学的一个方面。然而，它同样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实际上，历史学可以很合理地描述为是考古学冰山所露出的一角，因为就人类过去的 99% 以上的事物而言，考古学是唯一真正的信息来源。历史学（除了口述史学）只不过始于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在西亚文字记述的引入，后来很久之后，文字记述才遍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即使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而言，来自考古学资料的信息对于从文字获悉的知识仍然是有价值的补充——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常常是考古学家首先发掘出文件与手稿。

当然，在人类学与考古学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那就是，总的说来，人类学家的日子比较舒适惬意，他们能够观察人们的行为，调查作为信息来源的人，因为人类学是发生在现在的。（当然，有些学究在“后程序考古学”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中曾经指出，不存在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因为只要你开始意识到某一瞬间，这个瞬间就已经

去了。但是，这种类型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得到的观察只不过会引来人们大声的嘲笑。)考古学的答案则需要耐心地工作才能获得。这种差别几乎就是与一位开朗、敏锐的青年闲谈，还是与一具僵尸交谈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的另一必然结果就是，人类学家可以看到他们的研究对象如何行动，并且可以要求他们作出解释，而考古学家则不得不重建人们的行为。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作出大量假设，假设自从“解剖上的现代人类”可能在十万年之前出现以来，人类行为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是可以预测的。对于人类所开发利用的动物和植物也必须作出完全相同类型的假设：即，它们的行为、口味、气候与环境的宽容度或土壤和湿度都总是保持不变的，从而在对过去进行重建时可以进行可靠的推测。这些都是需要作出的庞大假设，特别是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确定这些假设是否正当，但是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要是没有它们，考古学根本就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以某种精确性猜出过去的人们在一组给定的环境下是如何动作的，那么，我们也许最好也放弃接受这一挑战，而去成为人类学家——那就不会这么令人头痛了。

二 确定日期^①

如果你不知道事物有多古老，或者至少知道哪些东西比另一些更古老，那么研究过去就没有什么意义。对这一学科有着无论多大的热情也不能代替一张可靠的年表——如果你不能获悉时间，那么只有爱好也无济于事。所以，考古学家是如何获悉日期的呢？

直到非常晚近，只有两种确立年表的方法——确定相对日期（这并不意味着与你的表妹出去约会）^②与确定历史日期。确定相对日期只涉及将事物——器物、沉积物、事件与文化——排成一个序列，确定孰先孰后。历史日期则来自自己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时期，诸如中世纪时期或罗马时期。对史前时期来说，只有确定相对日期是可能的，所以——虽然人们可以说青铜时代先于铁器时代，而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但是人们说不出具体的年代。

确定相对日期背后的基本推理来自地层学，这是对地层或沉积物如何一层覆盖着另一层的研究。总体来说，首先铺好的是下层，所以，下层在时间上早于上层。而对于在这些地层中所发现的器物也是同样的道理，除非曾经存在过某种扰动，例如，由穴居动物或者盗墓，垃圾坑或是腐蚀与再次

① 原文为 *making a date*，是一句幽默的双关语，既有“确定日期”之意，又有“约会”之意，译成中文后无法保持其双关的特色，只能保持其前一语意。

② 这又是一句双关语，原文为 *relative dating*，既有“确定相对日期”之意，又有“与亲戚约会”之意。

沉积所导致的各种扰动。

存在着找出在某一地层中的骸骨是否属于相同年代的方法，这就是用化学手段确定日期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埋入土中的骸骨中的氮含量要降低，并且它要逐渐吸收氟与铀。所以测定这些元素的含量将可以表明一组骸骨是同一时期的还是不同时期的。在本世纪 50 年代初期，正是使用这种方法揭露了所谓皮尔唐人（Piltdown）的骗局——据说这是猿与人之间的进化“缺环”，于 1912 年在苏塞克斯被“发现”但后来被证明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骗局。化学方法显示这一头骨是新近的，而下腭则来自一只现代的猩猩。这些骨骼曾经被玷污过，牙齿也经过修补锉平，以使它们看起来显得更古老，更令人信服。关于谁应当对这一恶作剧负责的争论仍然在无尽无休、令人厌烦地进行着。

其他确定相对日期的主要考古学类型是“类型学”，即将器物按照具有相同的材料、形状和 / 或装饰纹样的特点的类型进行分类。这整个体系依赖于两个基本思想：第一，来自某一给定的时代与地区的器物共有一种可以识别的风格（物以类聚），而这种风格的变化是相当渐进的。第二，在实际情况中，不同的风格可以共存，个别的风格可以延续很长的时间，而变化可以相当突然地发生，但是对短小的引论性书籍来说，好处就在于没有篇幅去深入到如此复杂的情境之中！

无论如何，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特别明显的是那些来自德语国家的考古学家——都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了建立详尽的陶器、工具和武器的形制的序列这一事业，后来他们又试图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序列组接到一起。不同的但是同时代的器物的整个收藏可以被捏成一个“集合”，而各个集合